

墓志所见唐长安城安仁坊宅第的时空分布探析

吴小龙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安仁坊是长安城里坊之一,位于皇城以南第三排、朱雀大街以东第一列坊,大致处于长安城的核心地段。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安仁坊内的大量遗迹与居民墓志重现天日,为研究当地居民的宅第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有不少名人曾在此居住,如勋官贵戚、高僧大德等,人物类型多样,名望很高。他们的宅第或自行营建,或皇帝赏赐,或祖宅世代相传,情况复杂,不一而足。这种情况与宅第主人的政治身份、经济财力、思想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受儒家观念、民间习俗、宗教信仰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唐代的等级制度下,安仁坊居民群体的生活空间受到一定制约,坊内宅第分布的时空差异十分明显。

关键词:唐安仁坊;墓志;宅第;时空分布;信仰

中图分类号: K928.6; K242; TU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1)05-0032-10

唐都长安是时人聚集之地,有文武百官、平民百姓,亦有道僧术士。世人所居宅第为住宅,僧人留驻之所称驻锡(统称宅第)。里坊作为独立单元,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空间。其中,宅第是唐人颇为重视的生活要素,有关长安宅第的研究成果有很多^①,一般认为,长安城住宅的分布是以朱雀大街为界,居民呈现“西富东贵”的规律。事实上,长安各坊居民的宅第分布相当复杂,影响因素亦不尽相同,宅第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以安仁坊为例,居于此地的百姓与僧人多“非富即贵”,宅第的营建与分布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且具体到某一个体时,其宅地情况各有不同,有一定的差异性。近年,唐安仁坊居民墓志大量出土,为研究安仁坊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安仁坊宅第的时空分布、迁宅现象、家族住宅承袭及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舛谬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唐代安仁坊住宅的时空分布

安仁坊原名安民坊,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因避唐太宗名讳而改名,是长安城众多里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以东,是皇城根下诸坊之一,归万年县管辖。据考古勘测,安仁坊平面形状略呈方形,东西 562 米,南北 540 米,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

米^{[1]129},坊内建筑类型齐全,文化元素十分丰富,大致位于唐长安城的核心位置(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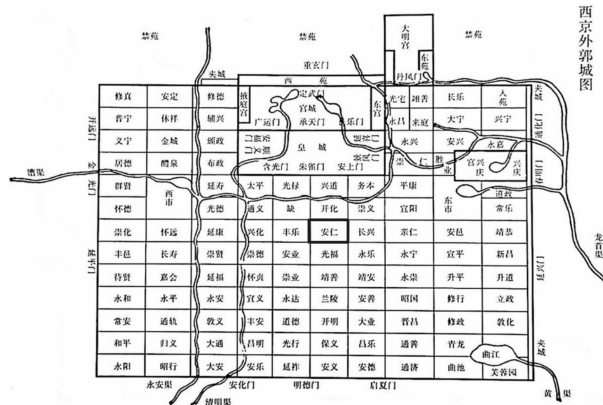


图 1 安仁坊在唐长安城位置^②

根据文献及墓志记载,唐代不少名人曾在安仁坊内居住生活,像万春公主、刘延景、王昕等皇亲外戚,杜佑、唐俭等高官勋臣,张孝忠、章仇兼琼等节度使,元稹、杜牧等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译经的高僧,如国内高僧义净,域外高僧金刚智、实叉难陀等。人物类型多样,且都是身份较为显耀之人,恰印证了长安城内居民“西富东贵”的分布规律。但安仁坊居民的宅第是有变化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兹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墓志,将安仁坊宅第分布整理如下(表 1)。

收稿日期:2021-03-28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0TS062);2021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2021G013)

作者简介:吴小龙(1994-),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Email:hbuxl@163.com

表 1 唐安仁坊宅第(驻锡)的时空分布^③

生活时期	人物	官职/身份	原籍	住宅位置	卒地	资料来源
初唐	庞卿恽	左武候将军	相州邺县人	不详	安仁里宅	《全唐文新编》第三册
	唐俭	户部尚书/莒国公	太原晋阳人	不详	安仁里第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唐嘉会	殿中少监/上柱国	太原晋阳人	不详	大宁里之官舍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元万子	尚衣奉御唐君妻	河南洛阳人	不详	安仁里第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张氏	赵玉内人	武城人	不详	安仁里宅	《长安新出墓志》
	法藏	华严宗三祖	西域康居国人	西北隅	大荐福寺	《宋高僧传》卷二十
	义净	律宗译经大师	齐州/范阳人	西北隅	大荐福寺翻经院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实叉难陀	华严三藏	于阗人	西北隅	大荐福寺	《宋高僧传》卷二
	释僧伽	不详	葱岭北何国人	西北隅	大荐福寺	《宋高僧传》卷十八
	刘延景	尚书左仆射/外戚	不详	东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王昕	汝州刺史/外戚	太原祁人	西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章仇兼琼	户部侍郎兼殿中监、西川节度使	蜀川人	东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盛唐	金刚智	密教三藏	印度人	西北隅	洛阳	《长安佛教史论》
	道光	大德禅师	绵州巴西人	西北隅	荐福僧坊	《全唐文新编》第六册
	元载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凤翔岐山人	坊南	长安城	《长安志》卷七
	万春公主	玄宗第二十五女	长安人	西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阳济	密州刺史/鸿胪少卿	河南人	东南隅	均州旅次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刘氏	彭城县君/阳济夫人/刘延景曾孙	京畿道岐州人	东南隅	安仁里私第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
	张孝忠	义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谷郡王	奚族乙失活部人	西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谷氏	邓国夫人/张孝忠夫人	魏郡昌乐县人	西南隅	安仁坊私第	《全唐文》卷五〇四
	于頔	太子宾客/燕国公	河南人	西南隅	不详	《长安志》卷七
	李氏	卫国夫人/于頔夫人	赵郡人	西南隅	安仁里第	《全唐文》卷五〇四
中唐	杜佑	户部侍郎/太保致仕岐国公	京兆万年人	东南隅	安仁里第	《长安志》卷七
	元稹	右拾遗/武昌军节度使	河南人	东南隅	不详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崔造	太子右庶子	博陵安平人	西南隅	安仁里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柳氏	相国安平公夫人/崔造夫人	不详	西南隅	安仁坊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郑綯	员外郎/太子太傅	郑州荥阳人	坊西门	昭国坊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陆邑	殿中侍御史	吴郡人	不详	安仁里私第	《长安新出墓志》
	陆儒	奉先县尉	吴郡人	不详	不详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
	杜式方	礼部尚书	京兆杜陵人	东南隅	薨于位(临桂)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李氏	杜式方妻/凉国太夫人	陇西成纪人	东南隅	安仁坊宅第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杜偁	朝散大夫	京兆杜陵人	东南隅	安仁里第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
晚唐	崔氏	杜偁妻	河北清河人	东南隅	安仁里第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
	苗绅	朝散大夫京兆少尹御史中丞	上党壶关人	不详	安仁里第	《洛阳新获墓志》
	杜牧	吏部员外郎	京兆万年人	东南隅	安仁里第	《杜牧集系年校注》

通过对以上统计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墓志及文献中明确记载居于安仁坊者有 35 人。其中初唐时期有 12 人,盛唐时期有 6 人,中唐时期有 15 人,晚唐时期有 2 人。除此之外,根据现有出土墓

志,大致可以推测出有部分人也曾在安仁坊居住。像阳济、李清禅等,从相关墓志中解读而来,由此居于安仁坊者不在少数。除其外,还有一些僧人,他们生前都曾将荐福寺作为驻锡之地参与译经工作。

当时的僧人主要有华严宗贤首大师法藏、华严三藏实叉难陀、律宗译经大师义净、密教三藏金刚智及其弟子一行、不空、智舟等,有本土高僧,也有域外僧人。从荐福寺安仁坊到唐后期,寺内的佛事活动十分频繁。安仁坊时空分布特征有如下三点。

1. 安仁坊居民群体的分布具有时代性

初、盛唐时期居于安仁坊者多勋官贵戚,人物身份多样。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是,初、盛唐时期是唐朝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期间涌现出了诸多有功之臣。像庞卿恽曾归于秦王李世民,参与玄武门之变,为唐初开国功臣之一;跟随唐太宗南征北战的唐俭,生前居于安仁坊,死后陪葬昭陵;章仇兼琼,曾攻取吐蕃安戎城,又治理蜀地,平定战乱,政绩卓著,为唐玄宗统治时期的有功之臣;还有元载,在肃、代朝升任宰相,并铲除李辅国、鱼朝恩等权宦,一度独揽朝政。至于贵戚,更不在少数。如万春公主为唐玄宗第二十五女,属皇室贵胄;刘延景为唐睿宗皇后刘氏的父亲,属皇室外戚;王昕为唐睿宗第五子薛王业的舅舅,亦为亲王外家;元万子,出身北魏皇室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世孙),又被封为河南县君。他们与皇室有关,身份地位显赫。即使部分官员品级较低,但大都因加赠而地位提升,与皇室联系紧密。如杜佑任户部侍郎,品阶仅正四品下,致仕后赠岐国公,达正一品;又如郑綯,其员外郎官职仅是从六品上,但他又有太子太傅之职,为太子三师之一,品阶为从一品,地位很高。

居住在安仁坊的高僧大德亦集中于这一时期,且有相当一部分为域外高僧。如西域康居国人三藏法师,其祖父侨居长安城,并以康作姓,三藏定居于长安,以荐福寺翻经院为驻锡之地,开坛讲经,译经著说,传播佛教思想;实叉难陀,为于阗高僧,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唐中宗即位后,应邀至长安大荐福寺驻锡,结果因病圆寂;禅师道光,开元二十七年(739)入般涅槃于荐福寺僧坊;葱岭北何国(碎叶国东北)释僧伽,年少时在本国出家,唐高宗龙朔初年始至西凉府,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因疾安置于荐福寺,并亡于此地;还有印度僧人金刚智,于开元七年(719),经海道到广州,又奉敕入长安,在大荐福寺结坛讲经,度化世人。很显然,这些域外高僧在这一时期驻锡安仁坊,与荐福寺的修建密切相关。加之,唐初为缓和社会矛盾,争取各阶层的利益,曾实行宽容的民族与宗教

政策。像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崇佛政策,试图利用佛教思想辅助统治。因此,在当时吸引了一大批颇有名望的高僧在安仁坊内译经、弘法。

中晚唐时期,居住在安仁坊的节度使是值得关注的群体。如张孝忠为义武军节度使,是著名的藩镇将领。义武军节度使是唐朝在河北地区设置的节度使,也是唐朝遏制河北三镇的桥头堡。建中年间,唐德宗将成德节度使分割为三,由张孝忠首任义武节度使。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在中晚唐显赫一时,朝廷对其十分忌惮。但也有例外者,如元稹,他曾任武昌军节度使,在此之前,已官至宰相,宅第位于安仁坊,享有较高待遇。结果大和四年(830),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元稹受到排挤,被迫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此职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设立,辖制在鄂、岳、蕲、安、黄等州。该地远离京师长安,对元稹来说,此次外调相当于贬官,结果次年死于治所之中。

2. 安仁坊居民生活空间的变化具有特殊性

通过解读墓志发现,安仁坊居民居地与卒地基本一致。根据上表统计,在35人中,有21人居于安仁坊,卒于安仁坊,像唐俭、元万子、杜佑、陆邑、于頔妻李氏、崔造妻柳氏等居民皆是如此。在剩余14人中,有8人卒地不明,其余者的居地与卒地略有差异,很可能是他们外出任职,死于任地。像杜式方薨于位,即桂州刺史(唐称临桂,今桂林),居地与卒地空间距离很大;据墓志可知,也有死于驿馆等地者,如岐阳公主薨于汝州长桥驿亭、阳济死于均州旅次。还有部分卒地不明者,如元载因罪被处死,其宅第不止安仁坊一处,故能断定他死于何地;刘延景、章仇兼琼、万春公主等墓志尚未出土,且史书记载不详,故难以断定;于頔、崔造、元稹等皆居于安仁坊,却未有卒地的记载,是否与夫人卒地一致,不得而知。这些宅第可考者,大都分布于安仁坊的四角方位,即东南、西南,又因荐福寺浮图院的修建占据了坊西北一角,因此至少在唐中宗以后没有居民的宅第位于安仁坊西北方位。且发现,安仁坊东北角似无官员居住,故可推测,坊东北很可能是百姓居住区。

3. 居民原籍与宅第位置偏差很大

居于安仁坊者有相当一部分祖籍并不在唐都长安,他们或由先祖迁居至安仁坊,自此定居长安,

或因任官迁居至安仁坊,在此居住。如《赠毛仙翁并序》提到元稹“入相之年,相候于安仁里”,即元稹任宰相之职时居于安仁坊,说明之前他并未住在安仁坊;据苗绅墓志可知,他为上党壶关人,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薨于安仁里第。上党壶关位于山西地带,即河东道。很显然,苗绅是因任京兆少尹之职才于安仁坊定居,并非原本宅第就在此地。甚至还有部分域外高僧,曾受命在大荐福寺从事佛教活动。

综上,以现有统计数据,得出初、盛唐时期安仁坊居民多勋官贵戚,身份多样,而中晚唐时期节度使一职更为突出。且平民百姓居于此地的情况史书未曾记载,尚不能确定,故居民多是品官较高者及僧人群体。这种时段性差别、群体特征,大致可以反映出安仁坊居民的时代特征、身份信息等情况。

二、唐安仁坊居民宅第相关问题

宅第是人的生存、生活与活动的重要空间,因此不论是高门大族,还是平民百姓,对宅第的营建都十分重视,涉及的相关问题也相对复杂得多。如宅第的归属问题、生活中的迁宅现象、家族宅第的承袭现象、住宅的信仰问题、宅第的数量问题等,在史料文献中记载较少,甚至无从得知。近年来,唐安仁坊居民的墓志大量出土,为解释以上问题提供了资料来源。

1. 宅第所属问题

在长安城拥有一处宅第实属不易,因而城内宅第的所属问题很值得关注。据《彭城县君刘氏墓志》得知,阳济夫人刘氏于建中二年(781)十月终于安仁里私第^{[2]64}。但此安仁坊私第究竟是何人之宅,尚需讨论。《刘氏墓志》记载其曾祖为唐睿宗朝陕州刺史、左仆射刘延景。而刘延景宅第亦位于安仁坊,那刘氏在安仁坊这一宅第是属其祖父所有,还是丈夫阳济在此坊另有宅第?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墓志,皆未记载详情,故祖孙二人所居宅第到底是否为同一处,暂无定论。

但以笔者之见,墓志中所记安仁坊宅第为刘延景所有的可能性较大。由《刘氏墓志》可知,其丈夫为鸿胪少卿阳济。鸿胪少卿在唐代为从四品官,官品较高,看似其有能力在安仁坊营建宅第,符合其身份。但《阳济墓志》记,唐德宗即位,念其旧勋,才拜阳济为鸿胪卿,刘海波推测阳济“任鸿胪少卿的时间定在大历十四年(779)至贞元元年(785)较为

妥当”^{[3]104},也就是说阳济任鸿胪卿是他晚年时期。而在此之前,阳济曾出任幕僚,时间为上元二年(761)五月至宝应元年(762)建卯月之间;后李光弼提拔阳济为密州刺史,不久便因丁母忧而离官,等阳济再任密州刺史时,约广德二年(764);其后阳济又出任潭州刺史、衡州刺史,大致是大历二年(767)到五年(770);他在升任鸿胪少卿之前还曾贬为明州司马^{[4]229}。凡此经历皆可证明阳济早年历任官品都不高,在安仁坊建宅的可能性很小。

关于阳济家族,其祖父阳璉曾任武涉县令,父亲阳杲曾为颖王府骑参军。从二人官职来看,政治地位很低,并非勋官贵戚,根本没有在长安城营建宅第的能力,更何况是安仁坊,故可以断定此安仁坊宅第并非阳济祖宅。所以笔者推测刘氏死于安仁坊私第,应该是祖父刘延景之宅,刘氏是住在娘家。这或许与当时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关,或是去长安城避难。关于这一问题,史书及墓志尚未记载,具体原因不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唐嘉会墓志》记载唐嘉会死于大宁里之官舍^{[5]269},很明显是死于任职之地。而他的妻子元万子,根据墓志可知,她死于安仁坊私第^{[5]150},因此唐嘉会夫妇的宅第应位于安仁坊。唐嘉会的父亲唐俭亦是死于安仁坊宅第,故唐嘉会夫妇所在宅第很可能就是唐俭之宅。而据墓志,唐俭因功陪葬昭陵,唐嘉会及其妻子元万子死后,迁葬于唐俭墓葬之侧。也就是说,他们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又同族而葬,符合中国的家族观念。

2. 家族宅第承袭现象

关于安仁坊宅第的归属问题,另一表现形式则是家族宅第的承袭现象。宅第是私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传至子孙,世代沿袭。

颇值得一提的是杜氏家族。杜佑在安仁坊宅第的由来有“发财置办”的说法,《旧唐书》记“(杜佑)甲第在安仁里”,又记杜式方“时父作镇扬州,家财巨万,甲第在安仁里”^{[6]3984}。荣新江先生考证亦认为京兆杜氏这所甲第并不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而是杜式方的父亲杜佑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时,发财致富,得以在安仁坊这样好的位置置办了一所甲第^{[7]23}。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氏家族所居之地应是长安城的黄金地带,遍布权贵。又据杜佑妻《李氏墓志》可知,李氏薨于上都务本里^{[8]190},由此推测杜佑在长安城至少有务本、安仁里两处宅

第。杜式方妻《李氏墓志》云:“以大和七年……弃孝养于京师之安仁第,享龄六十七。”^{[9]1138}可知杜式方夫妇居于安仁坊;《杜式方墓志》又记:“再迁太常主簿。始德宗孝文皇帝以诸侯方强,质其子于京师邸……”^{[9]1091}可知其子杜棕的宅第位于长安城,很可能就是沿袭杜氏家族的宅第,亦居于安仁坊。还有《唐尚食奉御杜偁墓铭》提到杜偁“大和元年十月九日终于安仁里第”^{[10]512};其妻《崔氏墓志》又记“元和十五年五月廿六日歿于安仁里杜氏私第”^{[10]489}。可知京兆杜氏家族的另一支杜偁夫妇亦居于安仁坊宅第。

杜牧为杜佑之孙,早年居于安仁坊,且此住宅应是继承祖父杜佑所得。但到“(元和)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奔走困苦,无所容归,归死延福寺庙……”^{[11]1058}晚年的杜牧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对安仁坊宅第出租转卖,又因家中奴仆无法豢养,自身无所去处,只能寄身于延福寺庙。可知杜牧晚年在安仁坊很可能已没有属于自己的宅第可居。他虽自撰墓志铭提到“终于安仁里,是其后仍得旧居也”^{[11]760},这应是杜牧对长安安仁里的情感寄托及他对安仁里政治诉求与向往的体现^{[12]119}。至于杜牧晚年是否真正住在安仁里宅第,目前尚无材料证明。但从以上论述至少可知,杜佑、杜佑之子杜式方、杜式方之子杜棕、杜佑之孙杜牧等都住在安仁坊,是从杜佑父辈杜希望传承下来的宅第。

3. 迁宅现象

安仁坊居民宅第有部分迁宅行为。据《酉阳杂俎》记:“郑綯相公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投瓦砾,五六夜不绝,乃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经久复归昭国。”^{[13]49}郑綯迁宅是因“忽有物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并将这种现象视为风水问题,认为居于昭国坊南门是风水不好,故迁宅至安仁坊西门。又因“瓦砾又随而至”,未能规避凶险,所以又搬回昭国坊。至于为何选择安仁坊,而非其他诸坊,史书尚无记载,具体原因不详。笔者以为,或许与他曾任太子太傅之职有关,安仁坊位于皇城以南第三排坊,距离朝廷更近,方便辅导太子。且郑綯在昭国坊、安仁坊至少各有一处宅第。

元载亦有迁宅行为。元载协助代宗除掉大宦官李辅国后,位居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元载凭借权力,贪污受贿,奢侈无度,据《旧唐书》载:“城中开

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来,未有其比。”^{[6]3411}结果元载因权力日盛,被代宗嫌隙,最终获罪。当时“并载大宁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6]3414},可知元载在长安城中的南北二甲第,即为安仁里、大宁里二宅。《册府元龟》亦载:“宋晦为虢州刺史,与元载贿交,率百姓采卢氏山林为载制造东都私第。”^{[14]8323}又可知,宋晦曾为元载在东都修建私第。说明元载在东都洛阳另有宅第,这也是一种迁宅行为。

4. 宅第佛教信仰问题

安仁坊内建有荐福寺、浮屠院,故居民住宅、僧人驻锡皆与佛教信仰息息相关。在唐代,很多高僧大德以此坊作为驻锡之地,如法藏、义净、实叉难陀、金刚智等。他们在大荐福寺讲经著说、翻译佛经等,传播佛教思想,吸引不少佛教信仰者来此膜拜。甚至有一部分高官或其家属因参悟佛道而在安仁坊择宅居住。

王昕家族即是典型代表。《唐王美畅墓志考略》一文考证“隋代长孙氏已迁至关中,故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应为雍州京兆人”^{[15]102},且王昕宅第又位于长安城安仁坊^{[16]52},故推测长孙氏很可能也曾居于安仁坊。《长孙氏墓志》载:“夫人宿植得本,深悟法门,舍离盖缠,超出爱网,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乃遗令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17]1030}可知长孙氏信奉佛教,很可能是因为这种信仰,其死后未与丈夫合葬。王昕妻《李清禅墓志》提到,墓主讳清禅,“诞灵淑慎,植性惠和”^{[18]368},可见李清禅信仰佛教。据考古发掘,王昕宅基址有彩绘千佛壁画残片、鎏金小铜佛、鎏金铜佛像背光残片等多件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出土^④,可见王昕或其家人应是佛教信仰者,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较大。这种佛教信仰很可能是他们在安仁坊择宅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问题仅是从墓志中解读出的相关人物的共性。关于安仁坊宅第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居民宅第数量问题,墓志显示居于安仁坊者大都不止一处宅第。《苗绅墓志》提到苗绅为上党壶关人,于咸通十五年(874)七月薨于长安城安仁里第^{[19]303},其祖父苗晋卿亦为上党壶关人,推测此地应为苗绅祖籍。他死于安仁坊很可能是由于祖父死后赠太师,

地位尊崇,以及他在长安任京兆少尹的缘故。又据苗绅妻《庾氏夫人墓志》,她薨于长安昭国里第^{[20]7991},可知苗绅夫妇至少在长安城有两处宅第。还有前文提到的郑綯、元载、王昕、杜氏家族等,都另有居地,恰印证了居于安仁坊者“非富即贵”的说法。

三、影响安仁坊居民宅第变化的因素

影响长安居民择宅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宅第并非长安城内简单的建筑空间或居住地,融入王公贵族、朝廷官员及高僧大德的参与,其分布便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气及宗教信仰。具体来说,唐代在安仁坊选择宅第主要与自然条件、里坊环境、经济财力、政治身份、思想观念等因素有关。

1. 自然条件与里坊空间

宅第建在何处,如何选择栖身之地,自然地形无疑是首要因素。唐长安城由隋大兴城扩建而来,地形有“五塬、六岗、八水、十一池”之说。其中六岗地势高度从北到南依次为 390 米、400 米、410 米、415 米、420 米、450 米以上,地面形状犹如《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一般,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图 2),“九四之地”便是安仁坊一带。此地地势相对较高,可避卑湿,且整体地形较为平坦,又有漕水流经,水源充足,适合居住与生活。从诸多自然条件来看,安仁坊十分适合唐人居住,所以达官贵胄的宅第多聚集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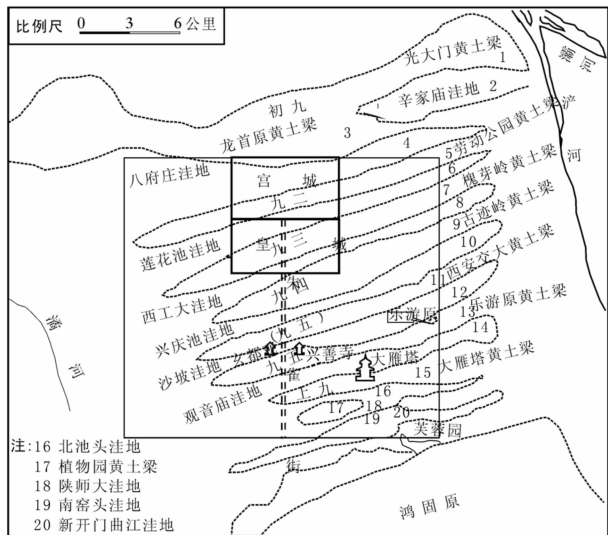


图2 隋唐长安城六爻地形示意图^⑤

自然条件如若是择宅的首要因素,那当唐人在

长安有所发展后,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宅第位置便成为他们考虑的又一重要因素。官员选择居于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参与朝政,与他们所处位置的空间距离有关,因此他们多居住在安仁坊并非巧合。就安仁坊位置而言,此坊在长安皇城之南,位于朱雀大街之东第一列坊、皇城之南第三排坊。该坊西临朱雀门大街,与丰乐坊相对;东临安上门大街,与长兴坊相对;北临外郭城第七横街,与开化坊相对;南临外郭城第八横街,与光福坊相对,大致处于整个长安城的中间位置,属万年县管辖。由此,安仁坊临近朱雀大街,且处于多个十字路交叉口,交通便利,外出方便;又位于皇城根下,距离皇城、宫城等宫殿相对较近,便于参与朝政、办理公务;且距离东西两市亦较近,又方便商品的买卖。因此,达官显贵的住宅多选在安仁坊就不难理解了。

2. 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

除自然因素外，唐人同今人一样，入城之初，在营建宅第时，着重考虑的应是财力问题。长安是唐朝都城所在，是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唐朝盛时长安人口达百余万，在此营建宅第必须严格控制，才能避免人地矛盾。无疑长安地价在当时很高，要想取得一块土地建宅并不容易，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所以当时长安城内房屋租赁现象十分普遍，有地方朝官，有外地商旅。像长安人杜牧就有出租、借住经历，按杜牧所言：“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11]1058}说明杜牧在安仁坊的宅第于元和末年曾因出租、变卖家宅而离开。虽然“（大中）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归远故里”^{[11]1068}，即杜牧再次回京做官，但此时的京城已没有他的宅第，故杜牧曾言：“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11]1068}即使在长安当官，也只能和长兄分开居住。说明祖父杜佑在安仁坊传承下来的三十间祖宅已经不属于杜氏家族。

事实上,依照唐令,在京城营建宅第并非仅有财富即可,还与居民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其政治地位是关键因素。因此官员在京城修建住宅既是财富的体现,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关于朝廷官员营建宅第问题,《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

义琰宅无正寝，弟义璉为岐州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璉来覲，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

爱我意哉!”义琰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6]2757}。

唐高宗时,李义琰提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意思是官员达到丞尉一级,就可以营建宅第。但唐代县丞不过八品,县尉仅九品,都是低品级官员,他们尚能修建宅第,更何况高官贵族。故长安城宅第众多并不稀奇,其中官员宅第占长安相当大的比例。像刘延景、王昕、万春公主、杜佑等,作为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在安仁坊居住生活,符合其身份地位。除此外,安仁坊也有节度使住宅,如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义成军节度使张孝忠等,他们拥有兵权,政治地位颇高,在安仁坊营建宅第亦符合其身份。

除了官员自己营建、购买宅第外,部分由皇帝赏赐而来。这些赐宅的规模面积多为豪宅甲第,赏赐宅第的原因及所在位置,定是经过统治阶层深思熟虑,这便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在安仁坊拥有一处住宅,既是经济财力的体现,也是政治势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史书及墓志对赐宅于安仁坊的记载很少,很可能是因为安仁坊内本身就多朝臣聚集,住宅尚无空缺,作为赏赐的机会较少。但像刘延景、王昕等贵戚亦有可能为皇帝赐宅,只是文献没有记载,无从考证。不论是自身修建或购买,还是皇帝赏赐,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宅第主人的地位之高。

3. 佛教信仰与风水之说

安仁坊内荐福寺、浮屠院等文化元素的存在,使佛教信仰成为影响唐人择宅的重要因素。荐福寺是唐睿宗、武则天为唐高宗追福而建,其后又修筑浮屠院。荐福寺浮屠院空间面积大,布局规整,规模宏大,吸引了不少官员、佛教徒在此驻锡居住,寺内佛事活动十分频繁。此外,安仁坊位置优越,西临最为宽广的朱雀大街。当时把朱雀门到承天门一段称为“天街”,因此这一带又被称为风水宝地。风水问题几乎是唐人择宅都要考虑的因素,它不是最为重要的,却是当时不可规避的问题。大唐虽然国力鼎盛,文化开放发达,但仍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唐人普遍寄托于自然力量,认为宅第位置的选择与仕途、命运相联,决定着命数走向。

上文提到,安仁坊位于唐长安城六爻的“九四

之地”,这也是风水说之使然。据《周易》解释:“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为阳,阳动故言跃。四为阴,阴虚故象渊。九四以阳居阴,阳则志于进,阴则不果于进,居上之下,当改革之际,欲进未定之时也,故有或跃在渊之象。”与之相邻的即为九五,“九五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五,天位,龙飞于天之象也。……九五刚健中正,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21]164}这与宇文恺营建隋大兴城理念相契合。《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固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22]1-2}所以,基于唐礼,唐人多不能居于“九五之地”。在风水学的影响下,官员选择居于“九四之地”的安仁坊,此地临近“九五”之君位,犹如“水中之龙”,以等待时机,实现腾飞。故认为“九四”是升迁之地,选此地居住也符合达官显贵的为官心态。

4. 宅主身份与住宅面积

中国古代沿用“编民”制度,按户籍分配一定的住宅用地面积。而长安城内容纳了大量官员和普通平民住宅,因此不可能任由居民修建住宅而不加限制,理应会制定出一个有秩序的宅第配给标准,以此来控制和稳定里坊内的住户。杜绍顺先生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资料得出结论,认为1-5亩是中国古代居民比较合理的住宅规模范围^{[23]132-139}。贺从容先生又在此基础上对长安城平民百姓住宅面积进行推测,认为平均每人一亩宅基地,而且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长安人口逐渐增加,居民住宅规模在不断缩小^{[24]302-303}。安仁坊空间有限,坊内居民的住宅规模定会受到一定限制。

以安仁坊为例,据当前发掘现状,在隋唐朱雀大街东侧的夯土遗迹和砖瓦分布区已发现11个房址,大致位于东西相连的几个院落内,基址规模较大。该宅邸院落位于安仁坊西南隅,是一组唐代达官贵人的宅邸建筑基址^④。又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安仁坊西南有汝州刺史王昕宅,王昕为薛王业的舅舅,是亲王外戚。从此宅大致方位及王昕身份来看,应为王昕宅。那包括王昕宅在内的诸宅面积究竟有多大呢?唐代实行均田制,规定“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25]74-75},而“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25]75}。唐代以二百四

十步为一亩,一唐亩折合 521.940 45 平方米^{[26]154}。据杨盾研究推测,王昕(外戚/汝州刺史,正三品)宅面积达 30 唐亩,还有元载(宰相,正三品)宅、章仇兼琼(户部尚书,正三品)宅、张孝忠(义成军节度使,正三品)宅皆达 30 唐亩,甚至万春公主(皇室女)宅、刘延景(尚书左仆射,从二品)宅面积更大,达 120 唐亩,与浮屠院面积相当;而杜佑(户部侍郎,正四品下)宅 15 唐亩,崔造(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宅 15 唐亩,郑綱(员外郎,从六品上)宅 7.5 唐亩^⑥。无疑,在均田制下,宅第面积大小与宅主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即官品越低,住宅面积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安仁坊总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坊墙内面积约为 584 唐亩,除去坊墙、十字街巷曲等道路所占面积约 100 亩,大约剩下 484 亩可以用作宅基地。”^{[27]31}安仁坊内建筑类型多样,基础设施完备,加之荐福寺的修建,自然会大大占据坊内的住房空间。因此,这些居民宅第并非并列所属,而是有重合的可能性,即根据他们生活时代的先后、住宅具体位置、住宅面积大小等,有些宅第存在“继承”关系。如王昕、元载官品同级,二人宅第面积一致,所居安仁坊位置皆在西南隅,且元载生活于肃、代宗统治时期,王昕生活于玄宗期间,相隔数十年,故推测元载宅应是延续王昕宅。

5. 礼仪等级与住宅规制

唐朝十分重视礼仪制度,对住宅的营建与规制进行了一定限制,并以唐代律令的形式保存下来,影响较大。《唐律疏议》记载:

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疏议曰: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若巷陌宽闲,虽有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28]417}。

在坊间生活,住房、种植等不能侵占巷街、阡陌,否则行杖笞之刑;但若因闲置而有种植,且不受影响者,可不受罚。这对坊内居民的住宅面积进行了控制,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唐会要》亦载: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为勅罪,兼须重罚”^{[29]1867}。这是利用敕令来限制坊内住宅的表现。除其外,房屋位置高度也受到一定限制。《唐律疏议》规定:“诸登高临宫中者,徒一年;殿中,加二等。疏议曰:宫、殿之所,皆不得登高临视。若视宫中,徒

一年;视殿中,徒二年。”^{[28]126-127}唐朝宰相裴度曾将宅第建在“九五”之地的高坡上,被人诬陷居心叵测,破坏了当时的礼仪等级,裴度便立即上书请罪,并拆除宅第。

所以,在统治者及唐令的限制下,里坊中居民的住宅建筑虽各种各样、分布各异,但皆与主人的身份、文化修养有关。像屋脊翘曲、墙壁彩绘、棂格雕花、屋宇高矮等各种搭配装饰,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也是礼仪规范的一部分。如梁枋,常用于木构建筑中,其用材大小决定住宅空间的规模与等级,装饰设计又是宅主地位的象征。故唐人对梁枋的使用颇为重视,大都布满彩绘,图案、纹饰多样。这在敦煌壁画中十分常见,如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就有以卷草、如意云头、团花纹样等为装饰的枋额(图 3),色彩繁多,线条飘逸,形状各异,其建筑规格较高。



图 3 枋额装饰^⑦

还有唐代的阙楼建筑,雄伟气派,为礼仪性建筑。如《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卷)有一幅阙楼图(图 4),图中有四座阙楼,斗拱硕大,屋檐高挑,红柱青瓦有秩,还雕镂图案纹样。此图展示的应为“三出阙”,代表唐代建筑的最高规格,一般建在皇帝居住的宫廷大门,是天下独尊的标志建筑。

安仁坊宅第亦受此影响。元载为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在安仁里的宅第十分奢华宏丽。据《杜阳杂编》载:

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绀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绀帐)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

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阳花,亦类白蘋,其花红大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30]1375}。

这与《旧唐书》所记相契合。从元载宅第的建筑陈设来看,极度奢靡,可堪比帝王家,显然已逾越规制,不合礼制。这也是元载为代宗嫌隙,将其抄家的重要原因。上文研究得出,元载宅应是延续王昕宅。故王昕宅的规制也并不低,应符合其亲王外家及刺史身份。所以,在唐代,住宅营建与规制虽有严格限制,但也会因现实因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类似元载宅等超越规制的现象。



图4 唐代“三出阙”[®]

四、结 语

安仁坊在长安城内位置显著,尤其政治、文化地位突出。近年来,唐代安仁坊居民的墓志大量出土,虽不能统计出居于此坊的所有居民群体,但大体可知安仁坊内聚集的基本是一些高官贵戚,政治地位较高。

通过对出土墓志的解读,发现:有的居民不止安仁坊一处宅第,有迁宅现象;有的居民信仰佛教,在此居住与荐福寺有密切联系,因此择宅与驻锡具有明显的宗教意味;还有的墓志虽记载墓主人居住在安仁坊,但其宅第是否位于安仁坊尚且存疑,因此有了安仁坊宅第的归属问题;而安仁坊又是不少家族的聚居之地,进而延伸出家族宅第承袭现象……涉及安仁坊宅第的相关问题有很多。这些问题的解释都要得益于对出土墓志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居于安仁坊又可视作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就是说,在安仁坊拥有一处宅第,并不是单由经济财力所决定,而是对择宅对象有着严格的限制。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儒家等级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

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唐长安城内居民对象、宅第规模、择址等都有一定的限制与规定,时空分布差异十分明显,这是唐代重视等级制度的重要表现。

参 考 文 献

- [1] 张全民,辛龙.隋唐长安城2012年考古新收获[A]//国家文物局.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 [2]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4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 [3] 刘海波.《阳济墓志》考述[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2):100-104.
- [4]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1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5]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2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 [6]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荣新江.高楼对阡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象征意义[J].中华文史论丛,2009(4):1-39.
- [8] 王连龙.跋唐杜佑妻李氏墓志[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0):59-63.
- [9] 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第4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 [10] 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1] 杜牧.樊川文集校注[M].何锡光,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
- [12] 李殷.杜牧居所变迁探析——兼论唐代京兆杜氏双家形态的维护[C]//唐史论丛:第2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 [13] 杜成式.酉阳杂俎[M].许逸民,许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 梁克敏.唐王美畅墓志考略[J].文物春秋,2016(6):97-104.
- [16] 徐松.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李健超,增订.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
- [17]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8]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 [19] 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20]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14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21] 来知德. 周易集注[M]. 王丰先,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2]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3] 杜绍顺. 唐代均田制平民应受田标准新探[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6(3): 132 - 138.
- [24] 贺从容. 隋唐长安城坊内百姓宅地规模分析[J]. 中国建筑史论刊, 2009(3): 275 - 303.
- [25] 李林甫. 唐六典[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26] 华林甫. 唐亩考[J]. 农业考古, 1991(3): 152 - 154, 168.
- [27] 杨盾. 唐长安城安仁坊及相关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 [28]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岳纯之,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9]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30] 苏鹗. 杜阳杂编[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A Study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s in An-ren Fang in Chang'an City of Tang Dynasty Based on Unearthed Epitaphs

WU Xiao-l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An-ren Fang, one of the residential wards of Tang Chang'an City, was located in the third row south of the imperial city and the first column east of Zhuque Avenue, hence the heart area of Chang'an City rough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work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relics and residents' epitaphs in An-ren Fang reappeared,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residential mansions of local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a variety of prestigious people were once living here, such as high-rank officers, noble relatives, eminent monks, lay Buddhists, etc.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mansions were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for some were built on their own, some were rewarded by emperors, some were ancestral home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so on so forth. This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identity, economic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deology of homestead owners, and also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folk customs and religious faith. Thus, under the hierarch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living space of An-ren Fang residents was constrained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a distinct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of mansion distribution.

Key words: An-ren Fang in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residenc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faith

【编辑 王思齐】

注释:

- ① 陈忠凯、杨希义:《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初探》,《文博》1991年第4期;陈忠凯:《唐长安城坊里宅第的有序分布》,《碑林集刊》第7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何文轩、贺从容:《唐长安城安仁坊内建筑格局分析》,《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9年第17辑等。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唐长安城住宅的分布、变迁、规模等诸多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 ② 图1来源于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
- ③ 为方便统计及研究,本文仅以文献及墓志记载为依据,对安仁坊住宅进行统计,故此表仅收录在安仁坊确有宅第者,不含推测者,关于推测者详见正文内容分析。至于时空分布,本表以文学角度将唐代划分为四个分期,即初唐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盛唐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至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中唐为唐代宗大元年(766)至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晚唐为唐文宗开成元年(836)至唐哀宗天祐四年(907)。
- ④ 参考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写的《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一期项目2018年考古调查报告》(未发表)。
- ⑤ 图2来源于李令福:《隋唐长安城六交地形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⑥ 诸居民官职及品阶参见官员墓志及《唐六典》;诸宅面积大小具体参见杨盾《唐长安城安仁坊及相关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1-32页)及。另,因此文对诸宅第面积已作统计说明,本文不再一一重复列举,仅以部分宅等为例,论述宅主身份与住宅面积大小的关系。
- ⑦ 图3来源于分别截取《中国壁画全集(敦煌5 初唐)》三九 菩萨一组图、六〇 持莲花菩萨图(二二〇窟)。
- ⑧ 图4来源于《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